

传统中国研究丛书

丛书主编 冯天瑜 杨华

# 汉语词汇语法修辞历时变迁考论

卢烈红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WUHAN UNIVERSITY PRESS





---

本书由“词语源流考”“词典词形、词义、读音处理辨正”“词法的历时变迁”“句法的历时变迁”“修辞表达的历时变迁”五个主要板块构成，以专题研究的形式，探讨汉语史上的词汇、语法、修辞问题，重视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的有机结合，重视古今贯通，重视现代方言材料的利用，致力于探明语言成分、语言现象的历史来源，揭示其现代走向，在建立单个词语、具体句式完整发展史方面特色鲜明。

---



武汉大学出版社  
官方微信平台



武汉大学出版社  
天猫旗舰店

- 责任编辑 / 李程  
                  黄河清
- 责任校对 / 李孟潇
- 版式设计 / 马佳
- 封面设计 / 涂驰

ISBN 978-7-307-20803-2



9 787307 208032 >

定价：76.00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创新工程系列成果

传统中国研究丛书

丛书主编 冯天瑜 杨华

# 汉语词汇语法修辞历时变迁考论

卢烈红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WUHAN UNIVERSITY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词汇语法修辞历时变迁考论/卢烈红著.—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9.12

传统中国研究丛书/冯天瑜,杨华主编

ISBN 978-7-307-20803-2

I.汉… II.卢… III.①汉语—词汇—研究 ②汉语—语法—研究  
③汉语—修辞—研究 IV.H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56255 号

责任编辑:李程 黄河清 责任校对:李孟潇 版式设计:马佳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箱:cbs22@whu.edu.cn 网址:www.wdp.com.cn)

印刷:武汉中科兴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20×1000 1/16 印张:19.75 字数:284千字 插页:2

版次:2019年12月第1版 2019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20803-2 定价:76.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我社的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 总 序

杨 华

统，原指从蚕茧中抽出的丝绪之结。缫丝时“抽其统纪”，抓住纲领，方能有序而高效。它引申为一脉相承的系统，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空间上，如《公羊传》所谓“大一统”；二是时间上，如《孟子》所谓“君子创业垂统”。

“传统”，本是一个动宾结构的词汇。传什么统呢？《后汉书》谓，日本岛上有三十余国与汉朝通使，“国皆称王，世世传统”，显然是指嫡嗣血统。明代“大礼议”时，廷臣们援引“三代传统之礼”以解决政治危机。所谓三代传统，即“父死子继，兄终弟及”。这是基于血统的政统，正如《文史通义》所概括，“易姓为代，传统为朝”。

在血统、政统之外，还有学统和道统。三教九流，诸子百家，各个学派都有其学术传承，称之学统。而道统，则专指从尧、舜、禹、汤到文、武、周公，再到孔、孟的儒家脉络，其核心是儒门“心传”的仁义道德。经过韩愈、朱熹等人发挥，成为后儒“判教”的法门。

儒家是否存在一以贯之的道统？自其说提出伊始，便备受批评。有学者由此而对整个中国文化是否存在传统也产生怀疑。其说有四：其一，从华夏到汉族，再到近代才形成的中华民族，混同杂居，族群融合，根本没有一脉相传的血缘统绪。其二，几千年来，文化存在巨大的时代差异，前朝后代之间，文化大不相同。其三，即使在同一王朝内，文化也存在巨大的地区差异。其四，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之间互有隔阂，儒家文化表面上占统治地位，下层社会

则更崇拜菩萨、神仙及各种迷信。所以，有论者认为，不仅儒家思想没有成为唯一的统治思想，甚至不存在一种整个历史时期全民族一致的、共同的文化传统。

诚然，儒家学说不是中国文化的全部，也不能代表中国的整体传统。和而不同，三教共弘，多元并进，或许更接近中国文化发生发展的历史真相。但是，对儒家正统的怀疑，不能引申出对整个中国文化传统的否定。

就空间差异而言，共时性的文化之间总有高低、主次之分。中国版图广大，地域辽阔，东西南北自然环境差异明显，人民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复杂多样，正所谓“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历代统治者借以整齐风俗，统一文化的精神工具，当然是儒家文化。读历代正史的《良吏传》《循吏传》即知，经过经学训练和科举选拔的各级官吏，每到一地，必兴利除弊，移风易俗，将正统思想推广到社会的毛细血管。扬雄《法言》说：“孰为中国？曰：五政之所加，七赋之所养，中于天地者为中国。”华夏衣冠的文化力量无远弗届，历史上少数民族和边疆政权大多认同华夏始祖，极力与之攀附亲戚。匈奴自称夏人遗民，拓跋鲜卑自称黄帝后裔（昌意少子），慕容鲜卑也自称黄帝后裔（高辛氏帝喾之后），北周宇文氏自称炎帝神农后裔。鲜卑以“华”自居而称柔然为“夷虏”，金人以“汉节”“华风”自居而称蒙古为“夷狄”。诸如此类，都说明游牧文明对农耕文明的追慕向往，仅仅用华夏之辨、正闰之辨不能做出完满的解释。正如唐人皇甫湜所说：“所以为中国者，礼义也；所谓夷狄者，无礼义也。”两千多年来，无论华夷胡汉，大多“尊经术，崇儒雅”，文化认同远大于种姓差别和地缘距离。这是一种传统。

就时代传承而言，历代文化风貌既有增损变易，也有沿袭继承，但总体而言，后者大于前者。且不说汉字经历至少三千五百年而今仍能为国人所识读，学术层面的继承性也相当明显。从先秦诸子到两汉经学，从魏晋玄学到隋唐佛学，从宋明理学到乾嘉朴学，每种形态既是对前代学术的批判，也是对前代学术的继承，没有前代的学术成就便没有后代的文化新变。再比如，从诗骚到汉赋，从唐诗到宋词，从元杂剧到明清小说，虽然状貌大有不同，有些文学

样式呈现出“能事已竭”的高度而令后代无法超越，但是这些文学样式之间并非断裂关系，而是承递关系。形式是如此，内容也是如此，“诗言志”和“文载道”本身就构成连续的文学传统。在价值层面，作为其传承载体的经史文献，浩如烟海，但其核心文本则相对稳定，能够为不同时期士人共读共鸣。体现在这些文本中的核心价值观念也一以贯之，为不同时期士人所尊崇。以史学传统为例，后朝为前朝修史，虽然在政治上改朝换代，否定前朝，但在价值观上则绍承前朝。后朝所修的前朝历史，大多以前朝之是非为是非，而不是相反，如是代代相沿。这也是一种传统。

就阶层区隔而言，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确实存在差别，但这不足以否定传统的存在。文化的二元乃至多元并存，是世界各民族文化史的共同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民间文化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但并未全然消解精英文化的正统地位。这二者的互动和流变，本身就是一种传统；换言之，雅俗之间、朝野之间，有时互相转换，但总体而言，小传统并未取代大传统。研究表明，在兵燹动乱时期，草根阶层对于中国文化的传承起到更大作用。这更是一种传统。

总之，如果否定中国文化的继承性和连续性，否定中国文化传统的存在，很容易陷入历史虚无主义，对于今天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民族精神，实现民族复兴，有害无益。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是教育部百所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之一，也是其中惟一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研究主旨的学术机构。二十年来，我们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研究和源流考察，致力于讲清楚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脉络、价值理念、社会结构、文化特质等问题，致力于挖掘传统文化中的有益资源，促进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尤其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元典时期和近代转型时期，亦即一流研究上，取得重大进展。

为了深化相关研究，我们编纂这套丛书。本丛书的选编，遵从以下原则：一是跨时代，无论传统之久暂与新旧，只要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过影响，均在研究范围之内。二是跨学科，学科分类和畛域划分纯是为了研究方便，如果藩篱视野而阻碍创新，则果断摒弃。三是开放性，既欢迎我中心学者的专精著述，也吸纳中心之外

的学术成果。

中国广大，代有盈缩；传统悠久，时有损益。我们既关注传统的中国，也关注中国的传统。

2019年5月4日于珞珈山麓

# 前 言

本书是我 2013 年以来研究工作的一个总结。

这 7 年来，我在汉语史研究中特别注意以下三点：一是为推进汉语史研究的深化，重视对单个词语、具体句式的完整历史的考察，力求建立单个词语、具体句式的完整发展史；二是重视古今贯通，溯源讨流，力求探明语言成分、语言现象的历史来源，揭示其现代走向；三是重视现代方言材料的利用，将普、方、古有机结合起来。书中各个专题的研究，大多体现了这些努力。

在研究领域方面，禅宗语录语法仍然是我这 7 年来继续耕耘的园地。同时，因参加《辞源》修订版（第三版）的撰稿、《汉语大词典》修订稿的审阅以及湖北电视台教育频道“汉字解密”栏目的撰稿讲述等工作，这 7 年来我对词汇、语义问题有了较多的接触，发现这方面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发展的空间很大，于是在这方面倾注了较多的精力。另外，这几年有感于语法研究应考虑语体问题，因此涉足修辞领域，在修辞方面也做了一些探索。

书中各个专题或属于词汇、语义研究，或属于语法研究，性质有别，加上撰写时间有异，因此写法不尽相同。这次结集出版，做了一些统一工作，但在体例方面仍然未能做到完全整齐划一。

体例方面还有几个问题需要说明：

第一，书中的研究利用了众多的原始文献，列举有大量的例句。例句的出处在例句后的括号内标明，标注的方式大体是：早期的文献或者整部文献篇幅不大，或者标明卷次而各卷篇幅也较小，因此例句后括号内仅标注书名、卷次，不标页码；后期文献特别是明清小说往往整部书篇幅较大，而每卷（回）的篇幅也不小，因此例句后括号内不仅标注书名、卷（回）次，还标注页码。这样做的

目的是便于读者核查原文，同时也旨在倡导一种严谨的学风。文献作者及其时代在例句后括号内是否标注，其处理方法则是：读者较熟悉的不标注，不熟悉的标注；特别需要强调例句时代性的则对作者及其时代予以标注。各原始文献的版本情况在全书后“主要引用书目”中列出，引用书目按音序排列。

第二，由于各节研究的是不同的专题，因此例句的编号基本上以节为单位，各节自为起止。表的编号亦以节为单位。

第三，书中参考了大量学者的研究著述，为避免频繁地出脚注，我们采用大多数语言学著述的做法，正文中凡引用某学者的观点，仅列出该学者的姓名，然后在姓名后出圆括号，括号内列出著述的出版或发表年份，如果是著作，则在年份后加冒号，冒号后标明观点出处的页码范围。至于著述的名称、出版或发表信息则在全书后“参考文献”中详细列出，“参考文献”按音序排列。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热心资助本书的出版，武汉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及编辑老师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大量心血，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书中疏误定然不少，请读者惠予指正！

卢烈红

二〇一九年十月

# 目 录

第一章 汉语史研究的特殊语料·····	1
第一节 帝王诏书的语料价值·····	1
第二节 汉译佛经透露汉语发展变化信息·····	5
第二章 词语源流考·····	9
第一节 “也罢”源流考·····	9
第二节 “何莫不”小考·····	26
第三节 “何莫非”考·····	35
第四节 黄梅方言中的“妈妈”和“老板”·····	47
第三章 词典词形、词义、读音处理辨正·····	59
第一节 《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词形处理献疑·····	59
第二节 《汉语大词典》释义献疑·····	77
第三节 “枉状”“月朵”词义考·····	86
第四节 “曝光”“爆光”考辨·····	94
第五节 “相亲”考辨·····	110
第四章 词法的历时变迁·····	124
第一节 今文《尚书》中的语气副词·····	124
第二节 先秦两汉的虚词“将”·····	134
第五章 句法的历时变迁·····	151
第一节 禅宗语录中选择问句的发展·····	151
第二节 禅宗语录中特指询问句的发展·····	164

第三节	禅宗语录中转移话题式复句的发展·····	186
第四节	禅宗语录中“只这(个)是”类强调式判断句的发展···	205
第五节	禅宗语录中“著”字祈使句的发展·····	218
第六节	禅宗语录中“在”字句的发展·····	231
<b>第六章</b>	<b>修辞表达的历时变迁·····</b>	<b>260</b>
第一节	《五灯会元》中的比拟句式·····	260
第二节	禅家会话过程中转移话题的艺术·····	272
第三节	语体语法：从“在”字句的语体特征说开去·····	282
主要引用书目·····		293
参考文献·····		301

# 第一章 汉语史研究的特殊语料

对汉语史研究来说，理论、方法、研究视角固然都重要，但最重要的还是语料。语言史是活的语言发展的历史，获取能反映口语的珍贵语料，是语言史研究的首要任务。汉语史研究有多种多样的语料，本章讨论帝王诏书和汉译佛经这两类特殊语料的价值。

## 第一节 帝王诏书的语料价值

语言研究离不开语料，理想的汉语史研究语料应该具备两个特点，一是口语化程度较高，二是确凿可靠。那么，帝王诏书能否用作汉语史研究的语料呢？

按常规理解，帝王的诏书语言一定很典雅，汉代以后的诏书一定是典型的仿古文言文，因此不能反映活的语言。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不少帝王诏书实际上使用了当时出现的新词、口语词，为我们研究活语言的发展提供了珍贵的语料。

帝王诏书还有一个与出土资料相同的优点，就是它不可能在流传过程中被修改，属于太田辰夫所说的“同时资料”，因此，它可靠性高，以它为依据得出的结论确凿可信。

例证一：

“将”字可用来表测度，意为“恐怕”“该不是”，是语气副词。由“将”参与构成的双音词“将非”“将无”“将不”也能表“恐怕”“该不是”义，也是语气副词。例如：

王闻婆罗门言，大用愁忧不乐，却入斋室，思念此事。王有夫人名曰摩利，就到王所，问王意故：“何以愁忧不乐？妾

身将有过于王耶?”(东晋·僧伽提婆《增一阿舍经》卷五十一)

佛命尼提,尼提闻已,周悼四顾:如佛所命,三界至尊,岂可唤我鄙贱之人?将无有人与我同字,唤于彼耶?(后秦·鸠摩罗什《大庄严论经》卷七)

前例是“将”的用例。此例说国王“愁忧不乐”,国王夫人摩利前来问候说:“您为什么忧愁不高兴呢,该不是我对您犯了什么过错吧?”后例是“将无”的用例。此例述尼提因为自己是“鄙贱之人”,当佛叫他的名字时,他不敢相信,心想:该不是有人和我名字相同,佛在叫那个人吧?

魏晋南北朝时期,汉译佛经中大量使用“将”“将非”“将无”“将不”等“将”系测度语气副词,中土文献使用“将”系测度语气副词也不少。就测度语气副词而言,魏晋南北朝是以“将”系为标志的时代。

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测度语气副词,“将”系是重点;要研究“将”系,必须先研究“将”。这里需要弄清楚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将”表测度语气的用法是什么时候产生的?这个问题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先秦时“将”可用为意愿义助动词、将来时体标记、选择连词,还没有测度语气副词用法。

两汉的《淮南子》《史记》《论衡》《汉书》中未见“将”的测度语气副词用法。

最终,我们从《后汉书》中的皇帝诏令中发现,“将”的测度语气副词用法至迟出现在东汉初。例如:

五月丙子,诏曰:“久旱伤麦,秋种未下,朕甚忧之。将残吏未胜,狱多冤结,元元愁恨,感动天气乎?……”(《后汉书·光武帝纪第一上》)

灾异屡见,咎在朕躬,忧惧遑遑,未知其方。将有司陈事多所隐讳,使君上壅蔽,下有不畅乎?(《后汉书·明帝纪》)

汉安元年,顺帝特下诏告河南尹曰:“故长陵令张楷行慕

原宪，操拟夷、齐，轻贵乐贱，窜迹幽藪，高志确然，独拔群俗。前此征命，盘桓未至。将主者翫习于常，优贤不足，使其难进欤？郡时以礼发遣。”（《后汉书·张霸传附张楷传》）

以上3例都是东汉皇帝诏令中语。《后汉书》的作者是南朝宋范曄，因此该书的叙述语言不能代表东汉汉语，甚至连对话也未必是东汉时的原貌，但皇帝诏令不可能被改动，一定是可靠的。第一例“胜”谓遏制，“元元”指老百姓。光武帝就“久旱伤麦，秋种未下”推测原因：大概是因为酷吏的恶行未得到遏制，冤案甚多，老百姓愁闷怨恨，感动了上天之气吧？第二例汉明帝就日食等“灾异屡见”推测原因：大概是因为有关部门的官员陈报情况多有隐瞒，致使皇帝受到蒙蔽，下情不能顺畅地上达吧？第三例汉顺帝就张楷未应召来京城推测原因：大概是主事之人习惯于常规，优待贤士做得不够，使他难于应召赴京得到进用吧？这3例都是皇帝就已存在的事实推测原因，“将”都不可能表“将来”，“将”所在的句子都是测度问句，因此，“将”义为“大概”，是表测度的语气副词。第一例中的光武帝刘秀是东汉第一位皇帝，诏书是建武五年五月颁布的，由此例可见，至迟在东汉初年，“将”已发展出测度语气副词用法。

东汉皇帝诏书以确凿的用例，令人信服地帮助我们解决了测度语气副词“将”的产生时代问题。

例证二：

丁声树先生当年写作《“早晚”与“何当”》一文，也利用唐太宗诏书中的语料成功解决了“早晚”与“何当”这两个问时之词的区别问题。丁先生指出：“何当”只能用于问将来什么时候，“早晚”既可用于问将来什么时候，也可用于问过去什么时候。他举的例子有：

近览来奏，请归旧山，已有别敕，不违高志，并许置观，用表宿心。未知先生早晚已届江外，所营栋宇何当就功？（《旧唐书》卷一九二《隐逸传·王远知》）

这是唐太宗降给道士王远知“玺书”(秦以后专指皇帝的诏书)中语。丁先生分析此例说:“此犹言未知先生何时已至江外,所营栋宇何时可就功也。‘早晚’与‘何当’并用,而‘早晚’言已然,‘何当’言未然,至显自可寻玩。”

这一例可注意的,一是唐太宗的诏书中使用了晋代出现的询问时间的口语词“早晚”,二是“早晚”与“何当”同现,非常有说服力地证明了“早晚”与“何当”这两个问时之词的区别。

例证三:

《皇明诏令》是明代初年到嘉靖十八年皇帝诏令的汇编,所收明成祖朱棣永乐七年正月初一《谕天下武臣敕》中有这么一段:

屯种养蚕最是好勾当,军家得饱饭吃,得暖衣穿,不靠损百姓,又不懒隋军。只是要恁军官每好提督,每年布种耨锄都要依时候。恁军官每常常早晚点视,休生事科敛,害他军人。每一个月好着实出力下屯,不许恁每隐占在家做生活,却交别个军每替他屯种。

“恁”相当于今天的“你”,“每”相当于今天的“们”。这一段非常口语化,通俗易懂。值得注意的有“勾当”和“别个”两个词。这里的“勾当”指事情,没有贬义,与今天“勾当”指坏事情不同。指事情的“勾当”是近代汉语时期出现的口语词,诏书中不避使用。“别个”是“别人”的意思。《辞源》(第三版)、《现代汉语》(第7版)皆未收“别个”,《汉语大词典》“别个”条义项二:

别人。清李渔《奈何天·崖略》:“莫说别个,就是阙忠辈阿,一般也貌昂藏,识字知书。怎奈这命低微,执铎随鞭。”鲁迅《而已集·读书杂谈》:“譬如学理科的,偏看看文学书,学文学的,偏看看科学书,看看别个在那里研究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汉语大词典》“别人”义的最早书证是清代文献,据明成祖《谕

天下武臣敕》，“别个”至迟明代前期就已出现，《汉语大词典》“别人”义的书证应提前。

总之，历代帝王诏书不避使用口语词且确凿可靠，能帮助我们解决不少汉语史研究中的关键问题，是一类很珍贵的语料。我们应该消除对帝王诏书语料性质的误解，充分挖掘、利用这一类语料。

## 第二节 汉译佛经透露汉语发展变化信息

汉语的口语和书面语在西汉以前是一致的，东汉以后，二者开始分道扬镳，逐渐形成了言文分离、文言文在书面语中占统治地位的局面。东汉以迄南北朝，汉语较先秦有了明显的变化，但由于中土文献中文言文占统治地位，这些变化在中土文献中得不到充分反映。幸运的是，始于汉代末年的佛经翻译事业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蓬勃发展，译师们译出了大量的佛经。出于宣传大众、争取大众的需要，汉译佛经使用较通俗的语言，因而透露了较多的活语言发展变化的信息，恰好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汉魏六朝时期中土文献的上述缺憾，为我们今天的汉语史研究提供了便利。

具体而言，汉译佛经在汉语语法史、词汇史、语音史还有汉字史等方面的研究中都能发挥积极作用。下面仅谈谈语法史和词汇史这两个主要方面。

### 一、汉译佛经在汉语语法史研究中的作用

#### (一) 显示新兴语法成分、语法现象的始见时间

汉语选择问句发展的大势，就关联词语而言，先秦主要用“抑”“抑亦”“抑为”“将”“意”“意者”“且”等，汉魏六朝进入以“为”系关联标记为特色的时代，此后逐渐向“是”字句归并。“为”系选择问句中，“为是”选择问句和“为当”选择问句均最早见于三国时期的汉译佛经，例如：

诸比丘等白言：“世尊，昨夜光明，照于祇桓，为是梵释四天王乎？二十八部鬼神将也？为是他方诸大菩萨来听法